

H 海南百年文化背影

如同孤鸿掠影，在私立海南大学、海南师范学院（今海南师大）、私立琼海中学（今海南中学）和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（原琼台书院、今琼台师范）等院校的校史上，都有留学法国的数学教授符孔遴的名字，但也仅仅是点到为止，对其人生足迹和心路历程，后人所知甚少。

最近一年来，旅居广州的海南籍建筑设计专家郑振絅先生提供线索，帮助海南日报记者找到符孔遴解放初期所写的《自传》和几封家书，并联系其母校北京大学等单位，共同采访了符孔遴的子女和亲友，根据他们的回忆，尽管未能看见其历史全貌，但符孔遴的形象至少已变得鲜活起来。

——编者

从文昌走出去的数学教授—— 符孔遴的不凡求学路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通讯员 郑振絅

清末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，文昌迈号一个贫困的儒生家庭里，出生了第三个男孩——符孔遴。

他幼年在家乡私塾读过传统的“四书五经”，进过旧制高等小学，中学时在广州读书，后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书，经受“五四”运动洗礼。

1929年，符孔遴赴巴黎大学留学，主攻数学，获硕士学位，并进入博士研究院深造。1933年回国后，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，符孔遴的思想和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“浪漫”的小学时光

据符孔遴的自传材料，他父亲是个读书人，善诗善文。8岁时，符孔遴在父亲的讲授下，已完成对四书的学习，两年后，又学完了五经，同时也涉猎到历史韵言和地理韵言等书籍。

13岁时，符孔遴才进入刚刚兴起的高级小学读书，有“跳出牢笼”之感。以他之前打下的国学基础，在高小应该是国文课居于第一，但由于对音乐、英语、算术各科都感兴趣，国文成绩反而一般。符孔遴觉得这“大概是以前读死书之果，本来读四书，亦相当有益，但费时太多，用力太过”。

他善于跟年长的、有学问的学友交往，因此得到不少提点。然而，年长的学友中也有品行不端的，“每道我浪漫，我潜伏已久的活泼个性，便乘机发展，尤其是对中乐一门兴趣特高，随时随地和人演奏，因为中国素来无高尚性格的训练，善音乐者，当时人多目为下流，前途相当暗淡，所以在高小的五年的最初二年，成绩虽列优等，而习惯的浪漫，行为的不检，内在极为矛盾……”

符孔遴1950年代初写的一份《自传》，真实记录了当年的经历和心迹。

高小第三年，正月的某天，教他的教员吉先生去符家拜年，被问及小孩成绩，吉先生开始支支吾吾不说，后来才道出符孔遴原来最骄人的国文，成绩已经退在音乐、英语、算术之后。第二天早上，符孔遴受到父亲严责，父亲准备停掉他的学业，好在吉先生再三说情才作罢。符孔遴回校后再也不敢碰音乐了，直到毕业的3年当中，“行为虽收敛，但学业亦不大长进”。

广州读书 每晚只睡4小时

符孔遴兄弟7人，上有2个哥哥，下有4个弟弟，教书的父亲每年收入

只够全家人糊口，因此，他小学毕业时，尽管成绩都在70分以上，但国文成绩不是第一，父亲便无意让他升学。但彼时他追求新知识的念想十分强烈，多次请求后，终得父亲同意。

符孔遴18岁时，进入广州两广师范学校附设的五年制实科中学（当时的中学分文、实两科）。前两年，他在校外寄宿，那时广州的社会环境不好，对走读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，符孔遴几乎陷入小学前两年的境地，但他处处反省时时警惕，尚不至于泛滥，但学业进步也不大。

第三年他才得以转为住校。校园环境甚好，在今广州市文明路中山图书馆、鲁迅纪念馆大院内，是清代的“贡院”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立中山大学的校址。在那里，符孔遴的学业渐入佳境。

有一个假期，学校开展运动会，各校都来表演，外校有一位小学生能流利讲演，又有一小学女教师和学生在草地上唱歌、游戏。这两个生动活泼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，使他深受启示并奋发全面进取。

在此后的3年中，符孔遴学习非常紧张，每晚至多睡4个钟头，这一习惯延续到了晚年。每天早起，必先在自修室朗读国文和英文，中午12时至1时必是阅读报纸，下午4时下课后必定打球2小时，6时洗浴，7时晚餐，8时至下半夜2时演练数学习题和预习功课，第二天所授课程，前一天必须熟读，到上课时不再翻看课本，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解，得益良多。

符孔遴每周六还看一次电影。

这样自觉、紧凑有序的学习安排，符孔遴三年如一日地坚持，对意志、体质、精神面貌大有裨益，各门功课全面发展，成绩均在前三名之内。毕业后，校长廖道传特别备文推荐他赴唐山路矿学校，免试入学，后来由于国内局势动荡等原因，符孔遴一年后转入国立北京大学。

学识、士气亦可救国

符孔遴1916—192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，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俄国十月革命、中国“五四”运动等大背景，也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，学校改故鼎新的年代。

符孔遴刚踏入北大校门，发现除少数师生外，多数沾染了官僚习气，学生除上正课外，不爱运动，他数年来每天2小时的球兴只好中止，这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健康。“幸得我中学基础颇

固，功课亦可应付得过”。

符孔遴在《自传》中称，大学的前两年，北京大学充满了官僚气象，袁世凯想当皇帝，传闻拟将北大改为“帝国大学”，而且准备让其子袁克文等进北大读书，当时的教授多是部长或次长兼任（除数学的外），“文法科的同学异常自骄，以为将来毕业或未毕业做官如拾薯，我虽是一个理科学生，且是一个球类的运动员，不知不觉间亦落入五彩云而沾其光……”

然而，蔡元培1918年出任校长后，自由思想进入北京大学，共产主义思想开始涌动。符孔遴此前得到一本“红皮禁书”，只能夜间、周日或假日才拿出来看，倍觉新鲜，喜不自胜，曾说过“人间最快乐的事，莫如雪夜读禁书”。当时蔡元培校长痛恶北大的官僚习气，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，痛斥“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”，主张自由思想大解放，于是，“禁书”才得以解禁。

当时的北大，是一个“主义”竞争的学府，最新学说的《新潮》和旧学说的《国故》同时在校内刊行，进行大辩论。

在北大的后三年，符孔遴心怀家国，抱负很大：“想至少要做一个国务总理，才能达到澄清政治的愿望；这种做官的观念，后来想之绝对错误，但当时政治的污劣，稍有志之士，应有这种观感。”

“五四”运动对符孔遴的思想转变影响极大，生活也变得异常俭朴，每餐费用不过五仙（“仙”是当时币值最小的铜板），三仙大面和二仙酱萝卜。因为北京官僚的生活奢侈与贫民之苦，有如天壤之别，让他内心愤愤不平。特别是有一次他从东学（宿舍区）走到马神庙（理科教室所在，也是北大本部）上课，身上穿的是一套普通的薄黑呢学生制服，冻得全身发抖，在街头拐角处看见一个乞丐一丝不挂，裸体而蹲，符孔遴的体温当即升高，一直走到教室上课时都不觉得寒冷，此后也常常以那个乞丐的境遇来警醒自己。

为了表达对官僚主义的疾恶如仇，符孔遴在宿舍中陈列各种科学模型和讽刺画。当时他做了一种“称衡”（天平），在一边较大而重的方木法码上写“民众”，在另一边较小而轻的法码上写“官僚”（故意写成“僚”字），以示对官僚阶层的反感与鄙视。

蔡元培的到来不但使得北大自由思想大解放，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大大提高，此前的官僚习气也一扫而清，符孔遴先前想做大官的念头，也转为想做一名大科学家，“我觉得不一定要做官才能救国，学识、士气亦可以救国”。同



1933年符孔遴夫妇与长女
符祥粤在南京留影。

符孔遴的家教家风

现居广州、今年74岁的符祥香（符孔遴的三女儿）接受海南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，她读私立琼海中学时，住在私立海南大学校园内，一般情况下，每天放学回到家后，父亲总会翻开书，用英语给她讲故事，印象中他能讲英、法、德、日等6种外语，但家里日常用语还是海南话。

“他为人和气、慈祥，从不打骂孩子。”符祥香说，“父亲身体好，不怕冷，不怕雨淋，经常冒雨洗澡。”

符祥香后来从广州造船厂退休。她说，父亲很擅长微积分解题，毕竟那是他的专业，遗憾的是自己后来从事的职业与数学无关，辜负了父亲一直以来的栽培。

符孔遴不但有一位以身作则的好父亲，自己也终生身体力行，为儿女们树立好榜样。

符孔遴父亲小时候因家贫给人放过牛，经常捡“薯落”（别人收获地瓜后遗落在地里的小番薯或残缺者），10岁才随舅父陈明经读书，他聪明过人，也肯用功，16岁前就考中了秀才。这位秀才父亲对儿子们管教甚严，命令他们除劳作之外，务必手不释卷，坚持自学，领会书中要义。

其父在读书、劳动和品行方面总是身体力行，他常说：“体欲劳，食欲少，是卫生之道。”他的教诲让符孔遴牢记一生：其一是劳动，读书不到一小时，必带孩子一起参加农业劳动，耕田、种菜、挑粪等；其二是善于与年长者交际，使子女从小就初涉社会，学习待人接物的规矩，知书达礼；其三是远离仕途，亲近农工。

父亲的这些美好品质对符孔遴往后的为人处世、修身齐家各方面的影响都很深刻，不但办事不辞劳苦，起早摸黑钻研学问，还与子女一道在租住的庭院中种植蔬果，而且尊敬师长，善待学生，明辨社会善恶，坚守做人底线。

1960—1965年，符祥香离家在华南工学院读书，其中高等数学是重点课程。她至今仍保存父亲给她的几封家书，十行的老式毛边纸信笺，用毛笔行书书写。信中除谈家人、亲友近况和家乡消息外，大部分为高等数学微积分符号、图解、方式和相当缜密复杂的推导演算过程，其间夹带不少英文、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对照，当然也有指导符祥香如何做事做人的谆谆教诲。由此看得出符孔遴对女儿的学习和成长十分关心，只言片语，也能反映出他治学态度和人生哲学——

学问均由积累而来，一个伟大人物成就就是由四条件来：1.学力（勤力）；2.天才（聪明）；3.寿命；4.机遇，但第一仍为寿命（年长的人，他一定有精神的收获），第二是学力，第三是聪明，第四是机遇。

你是一个行将毕业的大学生，社会上是相当有地位，况且又是一个女子，更是不容易的，古语说“事到临头会转宽”，就是事逢急迫时要从容处理。你差一年即完学业，这一年当好好安排，一个人不当因高而自骄，因低而自卑，骄容易落后，卑容易灰世。

（陈耿 郑振絅）同